

# 社会善念中不同角色差异和影响因素

张妍妍<sup>1</sup>, 冯晓杭<sup>2\*</sup>

<sup>1</sup>长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吉林 长春

<sup>2</sup>长春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 2023年6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3年8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3年8月28日

## 摘要

社会善念是在人际互动中意识到他人需要、愿意做出选择权让渡的一种动机。个体在社会决策任务中充当的角色有实施者、接受者和观察者三种, 行为实施者主要受到内在因素的影响, 行为接受者和观察者主要受到对方行为或其他的外在因素影响。不同的情绪能激发的社会善念水平存在差异, 道德情绪对社会善念动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认知因素中场依存和场独立人格特征是个体在环境中行为表现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这些方面的影响作用。

## 关键词

社会善念, 实施者, 接受者, 观察者

# The Difference of Different Rol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ocial Mindfulness

Yanyan Zhang<sup>1</sup>, Xiaohang Feng<sup>2\*</sup>

<sup>1</sup>School of Education,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sup>2</sup>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Jun. 20<sup>th</sup>, 2023; accepted: Aug. 16<sup>th</sup>, 2023; published: Aug. 28<sup>th</sup>, 2023

## Abstract

Social mindfulness is a kind of motivation in interpersonal to recognize the needs of others and to be willing to make choice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roles that individuals play in social decision-making tasks: enforcer, receiver and observer. The behavior enforcer is mainly affected by internal factors, while the behavior receiver and the observer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other side's behavior or other external factors. Different emotions can stimulate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kindness, and higher emotions also have certain effects on the motivation of social kindness. The

\*通讯作者。

internal cognitive factors of subjects, midfield dependency and field independence condition, are also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se aspects can be considered in future research.

## Keywords

Social Mindfulness, Enforcer, Receiver, Observer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前言

我们通常会忽视很多但又很重要的善意举动,其中小善就是其中之一,生活当中的善意举动,比如在餐厅就餐时不大声喧哗,安静文明就餐;按照先后顺序排队等候公交车等等,这样的小善行为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是被尊重的,而这种举动也被称之为社会善念。社会善念行为是一种亲社会行为,而这种行为是一种低成本、不需要太多牺牲就能达成,心中有善,不仅能与人为善,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日积月累形成善念还能够成就利国之大善,减少冲突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以往对亲社会行为研究大多以牺牲自我换取他人利益的方式来测量,但生活中遇到强烈冲突或者大善的情况有限,作为亲社会行为的新视角,生活中的小善却是处处可见,善意行为还能够增加信任感和合作行为(窦凯等, 2017)。近年来的国内外研究者对低成本的亲社会活动社会善念的研究逐渐增多,本文对国内外的社会善念的概念、研究方法、角色和影响因素进行梳理,来拓展未来研究思路。

## 2. 社会善念

### 2.1. 社会善念概念

社会善念指是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充满善意的关注尊重并保护他人选择的需要和权利的行为(Van Doesum et al., 2013)。在相互依赖理论和社会正念研究的共同推动之下被提出,社会善念涉及一种社会意识,识别目前情景下他人的需要和愿望,这就需要个体看到别人想要什么并做出相应的举动。只有当个体注意到社会善念的选择,他们才会表现出社会善念(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社会善念是一个人重视他人选择自由的能力和意愿的表达(Mischkowski et al., 2018)。有益于人际关系发展,具有社会意识的决定被称为亲社会行为。因此社会善念行为又被称为亲社会行为(Van Doesum et al., 2016)。

我国学者认为社会善念是一种关注他人可支配选择的心智技能和意愿动机,是一种积极的人际互动(窦凯等, 2017)。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善念是个体所具备的良好品质,在人际互动情境中表现是能感知他人状态、尊重对方选择同时愿意做出选择权的让渡(田一等, 2021)。

### 2.2. 社会善念相关理论

#### 2.2.1. 相互依赖理论

相互依存理论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情况,关注人们在情境当中的表现和个人动机方面的个性差异。在特定关系中,结果受到有能力的一方或双方的影响,个体的结果会被自己或者是对方所控制火自己和对方协同控制。在协同控制的情况下,双方的关系取决于利益的一致性。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会

被另外一方所影响控制, 被对方紧密控制的个体会表现出高水平的单向依赖, 个体自我控制代表独立性, 而协同控制意味着双方要依赖彼此(Fox & Kelley, 1978; Rusbult & Van Lange, 2003)。社会善念行为在相互依赖理论中可以解释为了个体关注到环境的不同, 并且受到有能力的人的决定的过程, 在选择过程中给对方留出的选择。

### 2.2.2.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是以积极心理学为背景提出认知动机观, 自我决定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需要。该理论的观点是个体都具备自我实现和成长的需要, 个体是具有积极向上的需求的, 具体表现为自主、胜任、归属三种基本的、与生俱来的心理需要。与此同时, 他们也希望能够在活动中拥有决策权和选择权(Deci & Ryan, 1985)。以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善念即个体在社会善念决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感知环境中的他人的能力, 还愿意做出善意决策给予对方更多的自主控制权以满足他人的需求。

## 2.3. 社会善念测量

### 2.3.1. 社会善念经典实验范式——SoMi 范式

2013 年荷兰学者 Van Doosum 从钢笔范式中攫取灵感开发社会善念(SoMi 范式)范式(Van Doosum et al., 2013), 简称 SoMi 范式。它是由一个由电脑生成的社会决策任务组成, 试着在一个包含两个完全相同, 第三个只在一个方面不同(例如 1 个红苹果和 2 个绿苹果)的同一类别的不同颜色的物品中选择一个(3 个物品中有一个不同颜色)。在假设情境中进行选择(物品不可放回和重新选择), 参与者是在与人互动中同时进行社会决策任务, 但不同研究的具体说明和类别数量会有所不同。

我国学者在 2015 年引入社会善念范式并增加了实验试次, 检验被试的选择的色彩偏好; 将实验材料更改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类别。SoMi 范式基本原理是如果被试在社会决策任务当中的非唯一物品中选择 1 个(如在 2 个红苹果和 1 个绿苹果中选择红苹果), 那么另外一个人拥有两种选择的权力(可以在红苹果和绿苹果之间进行选择), 这种情况被视为社会善念行为记 1 分; 如果被试选择了唯一物品(如在 2 个红苹果和 1 个绿苹果中选择绿苹果), 则意味着另外一个人, 不能再进行选择(只能选择红苹果), 这种情况则被视为非善念行为。整体的实验一共 24 个试次, 其中实验组包括 12 个试次(3\*1); 控制组包括 12 个试次(2\*2 或 3\*1)。实验中的每个试次以及每个试次中物品的位置均随机呈现, 最后计算总分占总选择次数的比例(或善念选择次数占总选择次数的比例)以此作为衡量个体社会善念的指标(窦凯等, 2017)。

### 2.3.2. 结构问卷

田一等(2021)结合中国人人格特质的特色性即人际关系, 编制大学生社会善念自陈量表。通过访谈和开放调查研究的方式探索社会善念词库。最终确定为善良尊重、包容理解、积极开放。在此基础上编制社会善念自陈量表, 最终形成二阶四因素词汇评定量表, 二阶为宜人特质和外倾特质; 四因素为善良尊重、包容理解、积极开放和谦和恭逊。该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方式,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适用于测量大学生社会善念水平(田一等, 2021)。

## 3. 社会善念中的不同角色

### 3.1. 行为实施者

作为行为的实施者来讲, 女生社会善念水平要比男生高(袁博等, 2022; Van Doosum et al., 2013)。对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亲社会的个体比亲自我的个体社会善念得分高, 得分与亲社会特征(即诚实、谦逊和 SVO)呈正相关, 有学者指出亲社会价值取向可能是社会善念动机组合中的一个候选者(Van Doosum et al., 2013)。研究发现初中生的社会善念不存在年级和性别的差异, 但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严益霞等, 2022)。

大学生正念正向预测社会善念, 社会善念正向预测智慧, 社会善念在状态层面对正念影响智慧间起中介作用。观点采择能够显著预测社会善念, 社会善念显著的正向预测智慧, 正念通过观点采择和社会善念的链式中介对智慧产生正向影响, 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观点采择与正念交互项显著影响社会善念(王伊萌等, 2023)。催产素会影响被试展现出的社会善念水平, 男大学生还会对具有高吸引力的面孔表现出更多的社会善念(陈琪等, 2020)。

成人的社会善念不受处理模式的影响, 但在直觉处理下会增加(Mischkowski et al., 2018), 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善念没有影响, 而对手的社会阶层会影响个体表现出的社会善念水平, 当对手玩家的所处的社会阶层面比自己低时, 个体会展现出更多的社会善念行为(Van Doesum et al., 2017)。对手玩家的面部的可信程度也会影响被试的社会善念水平(窦凯, 2016; Mischkowski et al., 2018)。通过社会决策任务考察社会善念水平, 随机分配三种条件, 其中对手玩家的身份是朋友、陌生人或敌人。结果显示若将陌生人的得分视为中性基线, 参与者确实对朋友更具社交意识, 对敌人更具社交敌意。内组成员对彼此表现出比外组成员更大的社会善念, 而两人对相反方向的陌生人的相应基线得分都有显著差异(Van Doesum et al., 2016)。

相关的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实施者更具有创造力(Grant & Berry, 2011), 不仅能够激发积极情绪, 还能够获得更多的人际信任和社会支持、资源共享、归属与爱的满足感、主观幸福感等, 能够减少压力等负面情绪。互惠的发起者也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不仅能使个人获益, 还能够激发创造力造福社会。在自主性需要被满足情况下, 不仅能提高行为实施者的幸福体验感, 也能从不同程度上提升接受者和观察者的幸福体验感(杨莹, 寇彧, 2015; 冯琳琳, 2017)。

### 3.2. 行为接受者

当行为接受者的自主性需要得到满足时, 个体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更强、消极情绪更弱。通过现场实验发现六年级小学生社会善念显著正向预测积极情绪(杜方园等, 2021)。积极情绪能够将大学生社会善念转化为更多合作倾向和行为, 自主性需要得到满足时在感知社会善念和积极情绪水平更高(窦凯, 刘耀中等, 2018)。社会善念水平高的成员在进行互动博弈活动时表现出更高的合作行为, 信任水平高的个体能够感知到更高水平的社会善念并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窦凯, 聂衍刚等, 2018)。感知社会善念水平高的大学生在投资游戏中会投入更高的额度, 两者之间时间距离和社会距离越短, 感知社会善念水平越高, 信任修复关系越快, 因此可以通过提高社会善念水平来提高信任水平(王怀勇等, 2023)。

社会善念行为的接受者作为情景中的被动接受者, 控制权相对较小, 只能被动接受事件结果。如果个体感受到他人的社会善念, 个体就会产生感激之情, 这种感激之情不仅会直接提升行为接受者的幸福感, 还会使人更有活力、乐观、坚强、富有同情心, 个人目标也更容易实现。作为未来的行为实施者, 在接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也会在未来的相似情境中传递亲社会行为, 如在公交车上投币时差最后一个硬币, 有人向你提供一个硬币, 这时, 你就会产生对对方的感激之情, 得到别人的帮助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是愉悦的, 在之后乘坐公交车的过程当中, 他人遇到这种境况的时候, 你想到自己当时的窘迫感和别人帮助你之后的轻松愉悦感后, 也愿意提供一个硬币, 传递这种亲社会行为, 社会善念行为亦是如此。

### 3.3. 行为观察者

大部分儿童认为留下选择人物更好, 并且愿与之成为好朋友, 社会善念理解得分均与心理理论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年龄增长的同时, 理解能力和心理理论都在快速发展, 儿童不仅在对他人的评价中会考虑到一个人是否表现出社会善念行为, 而且在选择朋友时也会考虑到一个人是否表现出善念行为(赵欣等, 2022)。成人是观察者或者是参与互动的行为接受者对行为实施者的评价无明显差异, 增加社会善念

的感知能力会使喜欢行为实施者的人更喜欢、信任行为实施者。行为的接受者在面对不同的社会决策倾向时, 会认为留下选择(两次选择非唯一物品、唯一物品和非唯一物品各选择一次)的人更可信赖和友好, 而面对两次都选择唯一物品的人, 会认为他们自私且不友好(Van Doesum et al., 2013)。

行为的观察者能看到行为实施者和行为接受者的选择和反应, 清晰的看到情景中的前因后果, 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评价行为的实施者。当观察者感受行为接受者的积极情绪时, 也会产生间接互惠的结果。通过观察施—受双方的行为和结果, 将情绪和行为代入到未来实施者和接受行为, 也会将这种行为实施到未来的亲社会行为的传递当中(冯琳琳, 2017)。亲社会行为的观察者会以两种方式转化观察结果, 作为未来的行为实施者会展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作为未来的行为接受者, 体会接受者受到的关怀, 在随后的情景中自己作为行为的接受者传递这种行为, 社会善念行为亦是如此。

## 4. 社会善念的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中被试的身份行为的实施者、接受者和观察者三种, 不同的身份会给被试带来不同的影响, 行为的实施者具有决定权, 行为的接受者被动接受结果, 行为的观察者转化施和受两种行为的操作和情感。已有研究发现影响社会善念的因素有: 内在因素(社会价值取向、人格特质、心理理论、观点采择能力、神经机制), 外在因素(年龄、性别、反馈条件、被试的流动性、对手玩家的社会地位以及面部特征)和其他。社会善念水平还能够促进合作行为、信任修复、发展积极的人际关系等正向功能。

### 4.1. 内在因素

亲社会个体的社会善念水平高于亲自我的个体, 这也说明个体展现亲社会行为时是受到内在的价值观的影响; 社会善念的表现与心理理论中情感成分显著相关, 高情感理论的个体比高认知理论的学生社会善念水平高; 观点采择能力强的个体, 社会善念水平也会更高; 催产素能够促进社会善念行为的发生, 说明神经机制对社会善念的表现也具有影响。

亲社会行为从本质上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实践活动(张伟达, 俞国良, 2022), 作为行为的实施者, 在情景当中拥有决定权, 能够掌控事件的发展方向,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面临的也可能是没有回报的付出, 此时被试的动机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行为的实施者能否做出具有社会善念的行为主要是受到内在因素的影响。

### 4.2. 外在因素

从年龄上看, 总体上看社会善念水平随年龄增长而增长, 从性别上看, 女性社会善念水平高于男性。幼儿社会善念理解能力, 小学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当中呈现总体特点, 但初中生不存在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从稳定性上看, 流动儿童社会善念水平低于非流动儿童, 目标高社会阶层被试社会善念水平要低于相同和目标低社会阶层。

当对手玩家的社会阶层高于被试, 被试所展现的社会善念水平越低; 对手玩家的面部可信程度和吸引力程度越高, 社会善念水平越高; 社会决策任务中反馈条件会影响社会善念水平, 积极的反馈条件更能促进社会善念行为的发生。

### 4.3. 社会善念影响后效

儿童选择朋友偏向社会善念行为多的儿童, 提高社会善念水平可以促进儿童的人际交往品质, 初中生社会善念没有年龄和年级差异。社会善念分为特质社会善念和状态社会善念, 与谦逊、随和人格特质关系紧密; 移情训练可以提高社会善念水平, 社会善念能够促进合作行为的发生, 信任关系的修复, 积极情绪的产生。合作行为, 信任修复都能够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处于良好的人际关系当中, 能

够促进个体积极情绪的产生, 还能提升人生幸福指数, 建立道德情感。

社会善念行为属于亲社会行为的一种, 亲社会行为实施者更具有创造力, 社会善念水平高的个体, 智慧水平也更高, 同理来讲, 社会善念行为的实施者也具有一定的创造力, 通过对社会善念的激发和培养, 能够激励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和能力, 增长智慧的同时还能促进个体的自我实现。

## 5. 社会善念的未来展望

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与社会善念正相关(窦凯, 刘耀中等, 2018), 道德情绪是按照一定的道德准则, 对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为或思想进行评价时产生的情绪体验(周详, 杨治良等, 2007)。道德情绪是高级情绪, 需要认知因素的参与, 此外道德情绪中的自豪与合作行为正相关(Leary et al., 1995), 感受到羞愧和内疚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何华容, 丁道群, 2016), 感受到尴尬的个体会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意愿和行为(王欣竹等, 2021), 窦凯等(2017)在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因素中明确指出自我意识情绪是影响社会善念行为这一执行功能的因素之一, 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察自我意识情绪对社会善念的影响(窦凯, 刘耀中等, 2018)。

人的认知风格分为场独立和场依存两种类型, 与亲社会行为显著相关, 与亲社会行为的类型有关(李斯琦, 2020)。场独立的认知风格是指个体以自我内在为参照, 在人际交往中较少受到情感等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场依存型的个体则更多地以环境等的外在条件来进行参照, 更注重人际交往, 对他人的感受和意见考虑更多, 因此, 在社会善念行为上认知风格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 基金项目

2022年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2022A20。

## 参考文献

- 陈琪, 陈冰, 刘来, 赵玉芳, 吴宗辉(2020). 催产素对社会善念的提升作用. *心理科学*, 43(3), 712.
- 窦凯(2016). *感知社会正念: 有效促进合作行为的心理机制*.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暨南大学.
- 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张庆鹏(2017). 人际互动中的社会善念: 概念、测评及影响机制. *心理学进展*, 7(9), 1101-1112.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9138>
- 窦凯, 刘耀中, 王玉洁, 聂衍刚(2018). “乐”于合作: 感知社会善念诱导合作行为的情绪机制. *心理学报*, 50(1), 101-114.
- 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刘耀中(2018). 信任还是设防? 互动博弈中社会善念对合作行为的促进效应. *心理科学*, 41(2), 390-396.
- 杜方园, 房英娟, 许莉婷, 陈永辉, 黄亮(2021). 儿童社会善念感知与情绪体验关系的研究.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34(2), 123-127.
- 冯琳琳(2017). *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作用和动机的调节作用*. 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 何华容, 丁道群(2016). 内疚: 一种有益的负性情绪. *心理研究*, 9(1), 3-8.
- 李斯琦(2020). *认知风格、信息加工方式对个体亲社会性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 田一, 王莉, 许燕, 焦丽颖(2021). 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心理学报*, 53(9), 1003.
- 王怀勇, 许雅梅, 岳思怡, 陈雅姣(2023). 感知社会善念对信任修复的促进: 社会距离与时间距离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43(1), 113-120.
- 王欣竹, 邹何辉, 郝娜, 黄瑶, 吴琴, 崔丽莹(2021). 抑制还是补偿? 尴尬情绪对初中生合作倾向和行为的影响. *心理与行为研究*, 19(4), 549-555.
- 王伊萌, 张敬敏, 汪凤炎, 许文涛, 刘维婷(2023). 勿以善小而不为: 正念与智慧——社会善念与观点采择的链式中介. *心理学报*, 55(4), 626.

- 严益霞, 刘颜葢, 丁芳(2022). 心理理论与社会互动方式对初中生社会善念发展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38(4), 485-494.
- 杨莹, 寇彧(2015). 亲社会互动中的幸福感: 自主性的作用. *心理科学进展*, 23(7), 1226.
- 袁博, 廖苏霞, 郭俏俏, 高奇扬, 陈思宇(2022). 流动儿童的社会善念水平及其提升.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 268-273.
- 张伟达, 俞国良(2022). 亲社会行为实施者何以更有创造力?——基于解释学认识论的内外因模型.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9(5), 81-92.
- 赵欣, 李丹丹, 杨向东(2022). 学龄前儿童社会善念理解的发展与心理理论的关系. *心理学报*, 54(8), 892-904.
- 周详, 杨治良, 郝雁丽(2007). 理性学习的局限: 道德情绪理论对道德养成的启示. *道德与文明*, (3), 57-60.
- Deci, E. L., & Ryan, R. M. (1985).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1-4899-2271-7>
- Fox, I. H., & Kelley, W. N. (1978). The Role of Adenosine and 2'-Deoxyadenosine in Mammalian Cells. *Annual Review of Biochemistry*, 47, 655-68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bi.47.070178.003255>
- Grant, A. M., & Berry, J. W. (2011). The Necessity of Others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Intrinsic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s, Perspective Taking, and Crea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4, 73-96. <https://doi.org/10.5465/amj.2011.59215085>
- Leary, M. R., Tambor, E. S., Terdal, S. K., & Downs, D. L. (1995). Self-Esteem as an Interpersonal Monitor: The Sociometer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 518-530.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8.3.518>
- Mischkowski, D., Thielmann, I., & Glöckner, A. (2018). Think It through before Making a Choice? Processing Mode Does Not Influence Social Mindful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4, 85-97.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7.09.001>
- Rusbult, C. E., & Van Lange, P. A. (2003). Interdependence,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ship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4, 351-375.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4.101601.145059>
- Van Doesum, N. J., Tybur, J. M., & Van Lange, P. A. (2017). Class Impressions: Higher Social Class Elicits Lowe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8, 11-20.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6.06.001>
- Van Doesum, N. J., Van Lange, D. A., & Van Lange, P. A. (2013). Social Mindfulness: Skill and Will to Navigate the Social Wor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 86-103. <https://doi.org/10.1037/a0032540>
- Van Doesum, N. J., Van Prooijen, J. W., Verburgh, L., & Van Lange, P. A. (2016). Social Hostility in Soccer and Beyond. *PLOS ONE*, 11, e015357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53577>
- Van Lange, P. A., & Van Doesum, N. J. (2015). Social Mindfulness and Social Hostility.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3, 18-24. <https://doi.org/10.1016/j.cobeha.2014.12.009>